

中美蘇戰略三角關係的形成 (1964-1979)

——從中蘇分裂說起

李丹慧

1950年2月新中國與蘇聯簽署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社會主義陣營在歐亞大陸連成一片，冷戰也從歐洲擴展到亞洲，從而形成了分別以美蘇為首的兩大陣營的全球性對抗，冷戰發生第一次轉型。其結果是，亞洲成為冷戰的「主戰場」，中蘇結盟共同對美，中國始終處於反美的前沿，成為社會主義陣營的「急先鋒」。1960年代，隨中蘇兩黨分裂，兩國同盟關係破裂，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國調整外交戰略，中美關係解凍，兩國聯合抗衡蘇聯，中國實際退出兩大陣營之間的對抗，國際冷戰格局出現第二次轉型，美蘇重新站在冷戰的第一線。就東北亞地區，尤其是朝鮮半島而言，冷戰的第二次轉型可以說重構了美日韓、中蘇朝關係的演變趨勢。不過，這次轉型在結束對抗性亞太安全秩序的同時，也留下了影響東北亞安全結構調整的變量。追根溯源，這一切變化還要從中蘇分裂說起。

一 中蘇談判：緩和機遇的最終失去(1964-1965)

1963年啟動的中蘇兩黨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意識形態大論戰，造成兩黨關係實質上破裂的事實。而社會主義國家關係以黨際關係為基礎的範式，決定了兩黨關係破裂後兩國關係也勢必破裂的命運。只是客觀言之，1964至1965年，中蘇兩黨兩國之間曾經出現過緩和關係的機遇。

其一，1964年2至8月中蘇兩國解決東段邊界領土糾紛的談判。中蘇邊界全長7,600公里，呈現出條約線、蘇聯地圖線和實際控制線三條界線並存的特殊狀態。在中俄國界形成的歷史過程中，這種狀態潛在性地構成了中國與蘇聯之間存有三筆領土賬：中國在與俄國簽訂的十九個條約中被迫割讓

的154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中蘇國界三條線並存的複雜狀況造成的3.5萬多平方公里的爭議地區（其中3.4萬平方公里在中蘇西段邊界，其餘在東段邊界）；沙俄通過武力非法佔有的17萬多平方公里的唐努烏梁海。這幾筆歷史遺留下來的舊賬客觀上長期存在，實際成為影響中蘇兩國關係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

進入1960年代，中蘇兩黨分歧不斷加深。隨着意識形態論戰的展開，兩黨關係逐漸惡化，兩國之間的界務糾紛開始日益被政治化，衝突事件不斷發生。1964年2至8月，在邊境摩擦和邊防鬥爭趨向緊張的氣氛和形勢下，中蘇兩國第一次邊界談判在北京舉行。

談判開始後，蘇方否定中方關於涉及邊界問題的中俄條約是「不平等條約」的定義，談判陷入僵局，意識形態論戰的色彩濃厚。其間，雙方代表團成立的工作小組一度將談判引入理智、務實地解決具體問題的層面，從東段邊界入手，討論國界線的走向問題，將「不平等條約」等政治立場上的爭論暫時擱置一邊，轉入比較務實的工作小組會晤。到6月，雙方互有讓步，就解決東段邊界問題達成協議，即除了先將黑瞎子島的歸屬問題懸置外，蘇方同意將黑龍江、烏蘇里江、額爾古納河上的爭議島嶼、爭議水面和爭議洲渚劃歸中國；作為補償，中方同意將阿巴該圖洲渚劃歸蘇聯。雙方並已起草好除黑瞎子島之外的整個東段邊界線的協議，準備簽署。至此，如果中蘇兩國代表團能夠簽署此協議草案，中蘇東段邊界問題將基本解決。隨着珍寶島等島嶼歸屬中國版圖，實際上已不存在有利於中方的與蘇聯兵戎相見的舞台。



第五屆「陳克文中國近代史講座」出席盛況（資料圖片）



李丹慧教授(資料圖片)

但是，就在談判室中透進一絲曙色時，7月10日，毛澤東接見日本社會黨人士代表團，同他們討論了蘇聯佔領日本千島群島等問題。在談到「蘇聯佔的地方太多了」時，毛澤東說：「一百多年以前，把貝加爾湖以東，包括伯力、海參崴、堪察加半島都劃過去了。那個帳是算不清的。我們還沒跟他們算這個。」^⑩12日，參加這次會見的日方人士在香港向媒體透露了毛澤東的談話內容。這是中國最高領導人第一次公開對外提出同蘇聯算150餘萬平方公里領土舊賬的問題，結果不僅激起了國際上的重大反響，而且直接打斷了中蘇邊界談判的進程。

7月末至8月中，當代表團休假結束、新一輪談判開始時，一方面，中國代表恢復了控訴的姿態，談判桌前再度充滿政治鬥爭的氣氛，不僅「不平等條約」問題、第一筆領土賬的清算貫穿會談始終，中國代表團還根據毛澤東的談話內容，提出了第三筆領土賬，即唐努烏梁海的問題，聲言中方有要求收復被沙俄佔領的領土的權利。另一方面，對於蘇方來說，毛澤東的這個談話已遠遠超出了意識形態論戰的範圍，具有公開仇視蘇聯國家和人民的性質。蘇聯代表團的立場也轉趨強硬，改變將黑瞎子島的歸屬問題懸置的態度，提出以解決該島問題為解決東段邊界其他島嶼等歸屬問題的先決條件。蘇聯代表團打道回府，要求將談判改到莫斯科進行。中國同蘇聯繼續進行磋商的有利條件顯然已經失去，兩國第一次邊界談判擱淺。中蘇兩國通過解決領土爭端問題緩和關係的機遇就此喪失。

其二，1964年11月赫魯曉夫(Nikita S. Khrushchev)下台後的中蘇兩黨會談。1964年10月，蘇共中央全會解除赫魯曉夫的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職務，由勃列日涅夫(Leonid I. Brezhnev)就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柯西金(Alexei Kosygin)出任部長會議主席。赫魯曉夫的下台，似乎給中蘇兩黨關係的恢復帶來了新

的機遇。就毛澤東而言，如果蘇共新領導人能夠改弦更張，國際共運能以中國共產黨的路線綱領為指導，則中共將留在國際共運內，引領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沿着中共的正確路線前進。為此，毛澤東決定暫停與蘇共的公開論戰，派周恩來率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俄國十月革命紀念活動，試探改善中蘇關係的可能性。

11月初，周恩來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慶典，同時準備與蘇聯新任領導人進行正式會談。此時中國代表團確定的談判方針是，「推」蘇共否定蘇共二十大的路線綱領，向中共的方針靠攏；蘇共新領導人則希望利用這一輪會談，在不放棄自己原則立場的前提下，先務實地實現求同存異。7日下午，中國代表團出席蘇聯政府在克里姆林宮大會堂舉行的招待會。席間，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 (Rodion Malinovsky) 在與周恩來等中國代表團成員交談時「酒後失言」，勸中國人像俄國人搞掉赫魯曉夫那樣搞掉毛澤東，並在談到毛澤東時使用了俄文中帶有污辱性的髒話。周恩來和中國代表團憤怒之極，當即退場，連夜急電中共中央通報情況，尋求指示。

毛澤東隨即給蘇共新領導人扣上「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主義」的帽子，確定要抓住這個「辮子」，在接下來的兩黨會談中採取攻勢，不惜鬧僵。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精神，周恩來在11月9、11、12日與蘇聯黨政領導人舉行的三次正式會談中，亮出了中共否定蘇共二十大至二十二大路線綱領的牌，矛頭直指蘇共的內部事務，利用馬利諾夫斯基事件向蘇方施加壓力，勸告勃列日涅夫等人不要把赫魯曉夫這個包袱接過來，要把它扔掉，改弦更張，另起爐灶。面對中共對蘇共內政的強勢干預，蘇共新領導集團開始為維護自尊和主權而戰，結束執政伊始觀望、猶豫、模稜的狀態，態度強硬地表示，蘇共中央將堅定不移地執行蘇共二十大以來所確定的路線綱領，在原則問題上絕不做任何退讓。雙方會談以失敗告終。其後，中蘇之間為營造緩和氛圍而持續一個月之久的休戰結束，兩黨關係開始重蹈覆轍，回歸政治論戰的格局。中蘇兩國通過赫魯曉夫下台改善關係的機遇隨之失去。

其三，1965年2月援越抗美新形勢下的中蘇兩國領導人會談。1964年末、1965年初，美國邁出擴大對越戰爭的步伐，越南局勢惡化。蘇聯新領導集團調整對越方針，改「脫身」為「插手」，開始加強對越援助；與此同步，蘇共中央將1965年3月初在莫斯科舉行的共產黨國際會議文件起草委員會協商會晤的主旨確定為：聲援越南人民、越南勞動黨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呼籲各兄弟黨停止論戰，團結反帝，共同行動。一時間，在反帝的「迫切任務」面前，國際共運各黨派、社會主義陣營出現了摒棄前嫌、恢復並加強團結、強化反對帝國主義的統一行動、聯手援越抗美的可能性。

為了彌合蘇中兩黨之間的裂痕、協調雙方對越援助的行動、勸說中共參加莫斯科三月會晤，1965年2月初，柯西金出訪越南時前後兩次在北京逗留。其間，周恩來同柯西金在4、5、10日舉行了五次會談，雙方在發展兩國貿易、執行文化旅遊協定、互派留學生等事項上達成共識，並商議在抗美援朝

的進程中協調行動。可以說，兩國領導人通過這次密集會談，為緩和兩黨關係、避免國際共運分裂做了最後的努力。

但是，2月11日毛澤東會見柯西金，談話氛圍轉趨凝重。毛澤東對柯西金關於蘇聯向越南提供地空導彈、大炮、坦克、魚雷艇等武器裝備，以及蘇中在越南問題上協調行動的話題不做回應，而是着重談召開兄弟黨會議的問題。毛澤東的實際態度是，舉行新的國際會議的時機不成熟，只有展開爭論，把是非說清楚才能開會。在勃列日涅夫看來，毛澤東的這個表態就是要繼續堅持讓所有兄弟黨無條件接受中共關於國際共運總路線的建議，直接向莫斯科展示了要與蘇共在國際共運領導權問題上爭短論長的決心。繼之，中共攜阿爾巴尼亞、越南、印尼、朝鮮、羅馬尼亞、日本等六個國家的兄弟黨拒絕參加3月1至5日舉行的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協商會晤，國際共運至此正式分裂。蘇共最終放棄與中共緩和關係的幻想，中蘇兩國在越戰升級背景下擱置爭議、聯合抗敵的機遇也最終流逝。

事實上，中蘇兩黨兩國關係發展至1964年已發生重大變化，一方面，隨蘇軍駐蘇中邊界兵力的不斷增強，以及蘇蒙關係趨向密切、蘇軍在重新駐防蒙古後着重加強在蒙中邊界的兵力部署，中蘇兩國邊界地區局勢的緊張程度逐步升級；另一方面，中國國內政治形勢出現變化，毛澤東着力尋找中共黨內、國內意見分歧發生的蘇聯背景，啟動中國內政外交政策向「左」轉的步伐。由此，以是年為轉捩點，毛澤東對國家軍事防禦戰略作出調整，由單一對美轉變為雙向的對美對蘇，蘇聯逐漸被視為中國國家安全的首要威脅；與此同時，對內醞釀發動一場政治大革命，清洗黨內國內的修正主義勢力，特別是深挖並清除隱藏在中共中央高層中的「赫魯曉夫的代理人」。中蘇敵友角色已發生質的變換，兩黨兩國關係發展的方向實際已被徹底扭轉。

在上述背景下，1964年出現的兩次緩和和中蘇關係的客觀機遇：前者，在毛澤東的認識中，談判桌前是一個沒有硝煙的戰場，居於主導地位的是政治鬥爭，邊界關係裏實際問題的切實解決須服從於政治問題的優先解決，要把握邊界制約機制，讓邊界鬥爭為政治鬥爭服務。以此，有必要使中蘇關係繼續保持一定的緊張度，避免談判較快取得成果，顯露中蘇和好的迹象。後者，赫魯曉夫雖然下台，但是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已通過與蘇共的大論戰而初步形成，一場防修反修的政治大革命正在醞釀之中，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靶子不能倒，取而代之的就是「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主義」的蘇共新領導集團。

至於1965年初越戰升級後出現的緩和機遇，面對蘇聯加強援越、蘇越關係漸趨密切、越南對中國的離心力增強的現實狀況，中國不能任由蘇聯打起領導反帝抗美鬥爭的旗幟，聽任其取得在越南問題上的發言權，讓越南投入蘇聯的懷抱。所以，對於毛澤東而言，實際已無再同蘇共言和的必要。毛澤東着手另起爐灶，確立領導反帝運動和支持世界革命為中國外交的中心目標。中共以世界革命領導核心的身份，啟動了中國對外交往的新階段。

二 中蘇武鬥：轉折變局的決然開啟(1966-1969)

1964年中蘇兩國邊界談判破裂後，蘇聯以中國有收復國土的意向為由，開始加緊向遠東地區增兵，中國周邊的戰略環境進一步惡化。特別是1968年8月蘇聯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使毛澤東明確把蘇聯作為中國國家安全的首要威脅，準備完成其從同時對抗美國和蘇聯到集中力量對付蘇聯的外交戰略調整，其間的關鍵性思路就是緩和與美國的關係。1969年中蘇珍寶島武裝衝突爆發、兩國關係一度瀕臨戰爭邊緣後，美國因素成為影響中蘇戰略結構變化的重要變量，轉折變局的帷幕徐徐開啟。對此過程的發展，可從幾個角度進行觀察。

其一，1968年初毛澤東糾正「唯我獨革」造成的中國外交領域無序狀態，為思考調整中國對外戰略準備了條件。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極左思潮給中國外交工作帶來嚴重的干擾和破壞。隨着1967年全面奪權鬥爭的啟動，外事領域的動亂局面進一步擴展。在1966至1967年一年多時間裏，中國同已建交和半建交的四十八個國家中的近三十個國家先後發生外交糾紛，國家關係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中國的對外交往呈現崩潰之勢。

毛澤東察覺後，從1968年3月起，針對外交工作中存在的種種「以我為中心」的做法，作出一系列批示，要求對外宣傳「不要強加於人」，並批評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的提法^②。周恩來、陳毅等人根據毛澤東的一系列指示，採取種種措施，對極左思潮的干擾進行了限制和糾正，積極恢復與修復對外關係，使外交工作比其他領域較早擺脫混亂狀態，較快回歸正常軌道，受破壞的程度相對輕些。這從客觀上為日後毛澤東提出「劃分三個世界」、建立國際反蘇統一戰線的設想和完成對外戰略策略的轉換提供了條件。

其二，1968年中後期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提出「勃列日涅夫主義」(Brezhnev Doctrine)、尋求與台北政權接觸的一系列舉措，成就了毛澤東調整中國對外戰略的信念。1968年8月蘇聯武裝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在六個小時內出兵佔領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與此同時，蘇聯在一系列聲明和宣言中提出了「有限主權論」等被稱為「勃列日涅夫主義」的一整套對外擴張的理論，為其任意干涉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行動提供了依據。翌年6月，勃列日涅夫又在莫斯科舉行的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上提出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倡議，試圖建立一個針對中國的包圍圈。

同期，蘇聯還一度將目光投向台海對岸的蔣介石集團，謀求與台北政權合作，同毛澤東領導集團對抗。1968年10月初至1970年末，莫斯科請身具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背景的《倫敦晚報》(*London Evening News*)蘇籍駐莫斯科記者路易斯(Victor Louis)與台灣方面取得聯繫，謀求使蘇台關係成為處理未來蘇中和蘇美關係的一個新籌碼。路易斯在此段時間裏多次與台灣方面進行接觸，通報說蘇共認為只有國民黨可以統一中國，莫斯科已對毛澤東的政權絕望；表示急欲同台灣當局公開來往，甚至不惜與「毛匪決絕」^③。與路

易斯進行聯絡的主要人物是時任台灣新聞局局長魏景蒙，他們的每一次聯絡和晤談，都經過蔣經國乃至蔣介石本人的耳提面命。在秘密接觸中，路易斯與魏景蒙共同探討了建立合作計劃，以及除掉毛澤東的可能性^④。美國方面察覺到這一動向，1968年11月4日《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報導說：蘇聯記者路易斯上月訪問了台灣。這是過去十九年裏台灣接待的第一個蘇方人士。據路易斯說，他在國民黨駐東京大使館「毫無困難地」獲得了簽證。中國方面也注意到這則消息，將之命題為「蘇一『記者』訪台和蔣匪幫勾搭」^⑤。蘇聯的動作，尤其是扶植反毛政權的謀劃，無疑給中國領導人投下了濃重的心理陰影。中方旋即公開給蘇聯戴上「社會帝國主義」的帽子，以此為毛澤東調整外交戰略作出革命理念、社會心理及邏輯上的鋪墊。

11月末，毛澤東忽然發聲改變對越美和談的態度，由過去的反對轉向支持。17日，毛澤東在會見越南總理范文同時明確提出：我贊成你們又打又談的方針。我們有那麼一些同志，就是怕你們上美國人的當。我看不會^⑥。他藉此向越方表示中國不再插手越美和談問題，不再反對河內的讓步政策。毛澤東的這種變化實際反映出他對打開中美關係機會的最初把握，帶有某種向美國候任總統尼克松(Richard M. Nixon)傳遞信息的意思，即中國作為對越援助最直接的國家，可以為美國從越戰泥淖中拔足提供助力。

其三，中蘇邊界武鬥不斷升級，1969年初中國在珍寶島主動出擊方案出台，一場政治意義大於軍事意義的衝突爆發，中國外交戰略調整中的關鍵性環節形成閉環。隨着中蘇兩黨關係破裂、兩國關係惡化，邊界衝突也逐漸升級，次數增多，範圍集中至中蘇東段邊界，形式和規模由棍棒式武鬥發展至蘇聯邊防軍動用武器開火威脅。其中黑龍江上的吳八老島、烏蘇里江上的七里沁島和珍寶島的衝突最為激烈，成為兩國邊境衝突的焦點。中蘇邊境緊張局勢進一步加劇。

1969年1月，黑龍江省軍區提出珍寶島反干涉鬥爭方案，設想以三個連左右的兵力參加該地區的鬥爭，以一部兵力上島潛伏。經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外交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批准、同意後，至2月末，中方完成了在珍寶島對蘇聯邊防軍進行主動出擊的周密安排。3月2日，中蘇珍寶島第一次邊界武裝衝突爆發，經15、17日兩次衝突後結束。其間，雙方圍繞此事件反覆進行政治上的較量，中方更是作出異乎尋常的反應，核心意圖就是利用這次事件做文章。此前，接受毛澤東研究國際形勢任務的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四位元帥從6月初至10月多次進行戰略務虛討論，向中央提交書面報告，全面分析中美蘇三大力量之間的矛盾鬥爭。陳毅還提出了從戰略上利用美蘇矛盾，打開中美關係的設想。

作為歷史研究的着眼點，「珍寶島事件」的關鍵問題在於時機的選擇，中國利用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制定和宣布新的大政方針、提出新的任務和方向之機，將中蘇武裝衝突的文章做大，藉此向美國發出信息，使之徹底明白中蘇關係已進入戰爭的邊緣，事實上蘇聯已被中國視為更主要的敵人。這

場邊境衝突的政治意義無疑大於軍事意義。一次小小的邊界事件在中國和國際上引起轟動效應，表明中蘇邊界爭端已成為中國對國際戰略問題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構成了中國調整對外戰略策略的一個關鍵性環節。「珍寶島事件」直接促成了1970年代初中國外交戰略的新調整。

其四，1969年3月「珍寶島事件」後蘇聯對中國進行核威脅，蘇美中三方的戰略博弈就此開始。中蘇珍寶島武裝衝突結束後，蘇聯一方面對中國實施軍事報復，於1969年8月13日出動飛機、坦克、裝甲車及武裝部隊，侵入中國新疆裕民縣鐵列克提地區，對中國邊防分隊實施突襲；另一方面積極通過各種渠道散布「將對中國核設施進行外科手術式打擊」的信息；並且在18日通過蘇聯駐美大使館外交官向美國國務院人員通報情況，詢問如果蘇聯打擊中國核設施，美國將如何反應，並解釋蘇聯實施此行動要達到的目的。美方則是先由中央情報局(CIA)局長私下向新聞記者透露，蘇聯代表已就對中國核設施發動先發制人打擊的可能性問題向其東歐盟國做了試探；同時，借力美國媒體、西方報刊開始散布此類消息。

就蘇方而言，如要對中國進行核威脅，實際上通過公開的輿論宣傳就可達到目的，而借多種渠道向美國、西方散布對華進行核打擊的信息，其根本目的在於試圖通過西方的信息傳遞，造成蘇聯將在此行動上與美國、西方聯手的假象，增強其對華核威懾的效果；或許還有一個目的，就是挑撥並阻斷中美兩國進行接近的步伐。美國等西方媒體（無論官方還是民間）關於此類消息的公開傳播可謂正中下懷，結果如其所願，9月11日，中國在蘇聯給出的9月13日最後期限之前（蘇聯6月13日提出與中國開始會談的期限為三個月），同意先進行兩國總理的會談。

對於美國來說，通過媒體、報刊散布相關信息的初衷，並非要挑撥中蘇關係，而是試圖藉此令中國了解蘇聯拉攏美國對華進行核威脅的動機，同時排除美國在此問題上與蘇聯勾結的印象。通過中蘇之間的這場戰爭危機，美國確實認識到中蘇關係改善的跡象基本消弭，中國已將蘇聯當作最主要的敵人，並將不得不面對來自蘇聯最為嚴峻的挑戰；而美國正需要北京幫助其制約莫斯科的擴張行為。

面對中蘇關係的現狀，毛澤東已決心並着手調整中國的外交戰略。

珍寶島一戰，實際帶來了中美進行接觸的契機，美中之間出現了聯手應對蘇聯的可能性。蘇美中三國之間的戰略博弈就此開始。

三 中美解凍：中美蘇戰略三角關係的初步形成(1970-1979)

中蘇關係進入敵對狀態後，面對北方與蘇聯軍力差距巨大、南方同美國和台灣當局長期軍事對峙的局面，及早擺脫兩面作戰的被動處境對中國來說顯得愈益必要和迫切。由此，中國有與美國進行接觸的需要。同期，蘇聯勃

列日涅夫領導集團的羽翼漸次豐滿，開始着手結束以往由赫魯曉夫確立的尋求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外交總路線，逐步將蘇聯的對外戰略調整到自己的軌道上來，對美國展開了咄咄逼人的全球攻勢。蘇聯勢力的擴展嚴重威脅到美國的全球利益及自身安全，使美國愈益認識到，蘇聯是美國的頭號敵人，是更具侵略性的國家；中國在美蘇對抗中則具有重要戰略價值，如果莫斯科得逞，北京屈服，蘇聯的全部軍事壓力勢必轉向西方。這樣，從1969年6月開始至1970年初，尼克松「聯華制蘇」的戰略構想逐漸成形，美方在對華關係上陸續採取了一系列更為主動的步驟。共同的國家安全利益為中美聯合抗衡蘇聯提供了基礎和前提，中美關係出現了緩和的轉機。

其一，1971至1972年中美實現高層會晤，兩國關係解凍，中美蘇戰略三角關係初步形成。中美兩國打破以往僵硬立場進行接觸後，從1971年7月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第一次秘密訪問北京到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中美《上海公報》簽署，雙方共舉行了近二十次會談。根據目前美國解密的美中高層會談記錄及尼克松與毛澤東峰會記錄，以及中國的相關檔案文獻資料，會談中雙方就朝鮮半島、台灣、印度支那問題，以及與蘇聯、印度、日本關係等問題達成了不少共識、默契，乃至合作意向。可以說，這兩個昔日的敵人，從開始的相互出牌、摸底試探，到捐棄前嫌、互諒互讓，討論內容的範圍之廣泛，協商議題的程度之深入，交換意見的態度之坦率，相互理解的過程之順利，達成共識、默契與合作意向的內容之微妙，在兩個相互隔絕二十二年、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迥異的國家之間的談判中，實屬罕見。

在1971至1972年的高層會晤中，中美之間雖然仍存在嚴重分歧，但是都對共同抗衡蘇聯擴張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在這一問題上兩國可說是共同利益頗多，幾乎沒有甚麼分歧，更加突出了反對霸權也即蘇聯擴張主義的共同立場。雙方不僅都承諾要使雙邊關係正常化，而且還在互通情報、於南亞次大陸問題上共同對抗印度和蘇聯等議題上達成共識和默契，確定了具體的合作意向。事實上，中美雙方通過討論印巴衝突時達成的支持巴基斯坦、反對印度的一致意見，邁出了聯合起來間接對抗印度背後的蘇聯的第一步。美方由此基本消除了對中國的猜疑和擔心；中方則從基辛格關於美國不要求中國停止援助越南、在軍控問題上不會迫於壓力提出反對中國的方案，以及承諾將不斷向中國通報有關核問題、美蘇限制戰略武器談判及裁軍問題、蘇聯在中蘇邊界的軍力部署、蘇聯對美中關係的反應、蘇聯對蘇中1969年10月開始的第二次邊界談判的反應等情況，增強了堅持援越抗美與尋求中美和解同時進行的信心。尼克松甚至表示，如果中國成為第二號超級大國，那麼美國就可以削減軍備了。以此初步描繪出了中美聯手，成為「準盟友」的藍圖。

1972年2月，中美《上海公報》的發表標誌着兩國之間實現了和解。其後雙方迅速開闢出聯絡渠道，率先在情報信息領域開始了兩國之間的合作關係，

其中不少情報屬於核心機密。此種狀況反映了中美兩國通過高層會談和峰會所建立起來的信任程度已達到一定的水平，預示了雙方能夠開始進行深度合作的前景。這些具體情節，大大充實了中美在《上海公報》中所聲明的，主旨在於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共同立場的內涵。

1973年1月越美《巴黎和平協定》(Paris Peace Accords) 簽字。越南戰爭結束伊始，中美雙方即順利無阻地着手進一步落實聯合抗蘇的戰略構想。是年2月初，尼克松批准美國向中國出售包括四架飛機等裝備在內的八套定位導航系統，中美之間在軍事上的初步合作就此啟動。此後不久，美國國防部特別小組即着手進行中蘇衝突的個案研究，設想在蘇聯發動摧毀中國核能力的大規模軍事行動之後，美國對中國實施軍事援助的方案。中美兩國通過進行軍事合作構築起一種「準同盟」性質的戰略安全關係，這種雙邊關係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成為維繫中美雙方交往的紐帶。毛澤東「聯美抗蘇」的戰略意圖初步實現，中美蘇戰略三角關係大致勾勒成形。

其二，1973年起毛澤東「一條線」、「一大片」，「劃分三個世界」，建立國際反霸、首要是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統一戰線的戰略構想的提出。1973年2月15日基辛格第五次訪華時，再次向中國領導人強調中美所共同面對的蘇聯威脅問題；毛澤東則在會見基辛格和1974年1月5日會見日本外務大臣大平正芳時，分別提出了「一條線」、「一大片」的思想，認為中美兩國「只要目標相同」，就可以「搞一條橫線」，即把從中國、日本經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歐洲到美國一線，以及這條線周圍一大片的所有國家團結起來，共同對付蘇聯的擴張，以此對外明確提出了「一條線」、「一大片」的聯合反霸戰略。1973年3月，侵越美軍開始撤出越南南方。5月1日，中美雙方在華盛頓和北京互設聯絡處，兩國共同朝着正式建立外交關係的目標邁進了一大步。

1974年2月22日，毛澤東在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 (Kenneth D. Kaunda) 時，進一步明確提出了「劃分三個世界」的戰略策略思想。其後，鄧小平於出席4月10日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的發言中，第一次向全世界完整地闡述了毛澤東的這一新思想，在國際論壇上公開表明了「劃分三個世界」思想的主旨，即建立最廣泛的國際反霸，特別是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統一戰線。1975年1月，周恩來在全國人大四屆一次會議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闡述了這一思想，四屆人大通過的新憲法進而賦予這一思想以國家根本大法的形式，使之發展成為一種國策。事實上，這時仍將美蘇兩霸並提已只是一種形式上、宣傳上的需要，美帝國主義在其中僅起陪襯作用。正如毛澤東對基辛格所說的：中美要共同對付蘇聯，有時我們也要批你們一回，說「帝國主義去你的吧」！「不講不行呢」。

文革結束，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召開，華國鋒在政治報告中首次明確將毛澤東「劃分三個世界」的思想作為一個理論和一種戰略策略加以評述，指出這是國際無產階級在當代的正確戰略和策略規定，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此後直至1980年代初期，中國制訂對外政策的基本依據，仍然是毛澤東「劃分三個世界」的理論。此時期中國以蘇劃線，強化國際反蘇統一戰線的外交戰略，在聯美抗蘇的進程中，政策上的靈活性備受限制，自身在中美蘇三角關係中的戰略地位大大削弱。中國國內發展戰略的選擇，以及與之相匹配的外交總體結構的調整，要留待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去謀篇布局了。

其三，1978年中美發表建交聯合公報，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新決策，中美蘇三角關係中注入了新的經濟因素。1978年12月16日，《中美建交聯合公報》發表，決定自1979年1月1日起兩國建立外交關係。時隔一日，12月18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討論把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鄧小平則實際成為中共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在中國國內發展道路出現重大轉折的過程中，鄧小平於某種程度上將改革開放戰略決策的着眼點投放到中美蘇戰略三角關係的運行軌道中，以着力推進國際反蘇統一戰線為槓桿，撬動美國及其西方陣營對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支持。這應該也是1970年代末、80年代初，鄧小平成為中共黨內毛澤東「劃分三個世界」外交戰略思想最堅定的支持者和執行人的原因。

在中美正式建交之前，1978年10月下旬鄧小平出訪日本，11月訪問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穿梭於美國及西方集團的盟友之間。鄧小平此行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向西方世界傳遞中國準備對越南作戰的信息。在訪問期間，鄧小平反覆向美國的這幾個盟友強調越南的角色就是「東方的古巴」，蘇越條約不僅針對中國，而且暴露了蘇聯的全球戰略和亞洲戰略，蘇聯正在加緊擴增其太平洋艦隊，而中國的方針就是反對蘇聯的戰略部署。以此擺出一種懲罰越南實質就是對抗越南身後的蘇聯的姿態，向美國及西方集團展示中國教訓越南的真實意圖所在。與此同步，12月中國軍隊已做好入越作戰的準備。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鄧小平月底出訪美國，與卡特（James E. Carter）總統會談，明確通報中國準備軍事教訓越南的決定。鑒於美國將1978年12月25日越軍入侵柬埔寨定性為蘇聯支持下的侵略行為，鄧小平正好藉此表明中國與美國立場一致，闡釋在此問題上中美有共同的利益，以推動美國邁出對中國的經濟改革進行實質性援助的步伐。美方雖然對中國出兵越南持反對態度，但在中越開戰後，還是幫助中國監測蘇聯的動向，提供情報信息。

2月17日至3月16日，一場中國「對越自衛反擊戰」爆發。這場戰爭的重點在於它的政治目標，也即政治目的；而其軍事目標是有限的，只是部署為一場短暫的越境戰役，僅為給越南人一個教訓。就政治目的而言，這場戰爭實際就是通過教訓越南打擊其身後的蘇聯，爭取獲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中國改革開放大業的支持和援助。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這是鄧小平為了推動改革開放進程而向美國立下的一份投名狀。具體言之就是，顯示中國在美蘇鬥爭中的價值和地位——中國能夠幫助美國對付蘇聯，以此使西方可以比較放心地把資金和技術轉移給中國。就此首要目標看，中國的目的達到

了。可以說，這場戰爭同十年前的珍寶島武裝衝突一樣，也是政治意義大於軍事意義。

其後，中美之間密切的戰略合作關係大幅推進。據中國軍方人士提供的資料，中越戰爭結束，是年5、6月雙方互換戰俘，在到場的蘇聯及華約國家記者為越南方面大唱讚歌時，美國及北約國家的記者則為中國站隊喝采。其後，北約國家開始向中國加緊輸出軍事技術，到1980年代初，英國還將桑恩電子公司(Thorn-EMI)新研製的「辛柏林」雷達(Cymbeline)售給中國。此為當時最現代化的反炮兵雷達，能夠使中國在其後與越南的軍事衝突中捕捉到越軍炮彈的彈道，迅速予以精準反擊，打得越軍不敢開炮，有力支持了老山、者陰山對越輪戰的勝利。同期，美國和西方集團的對華經濟支持和援助也已到位。

中蘇分裂與中美蘇戰略三角關係初步形成後的變化發展，將隨三國各自戰略利益的權衡而發生新的調整。不過具體到目前朝鮮半島戰略結構的變化，有一個現象值得重視：美及俄中三國關係的變化固然是構成半島戰略格局的主要因素，但韓國和朝鮮的作用也不容忽視。所謂在兩個大球對抗的天平中，小球的滾動方向往往會使力量對比發生重要的變化，有時甚至是決定性的變化。其中朝鮮尤其是一個不可控的變量，情況令人擔憂。

註釋

- ① 〈毛澤東接見日本社會黨中、左派人士的談話記錄〉(1964年7月10日)，廣西壯族自治區檔案館，X1/35/116，頁37-38。
- ② 中共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議七個文件彙編：《毛主席關於對外宣傳工作的重要批示(1967年3月-1971年3月)》(內部資料)，頁2、4-6。
- ③ 《蔣介石日記》，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1968年10月24、26日。
- ④ 台灣聯合報社編譯：〈蘇聯特務在台灣——魏景蒙日記中的王平檔案〉，《冷戰國際史研究》，第5輯，2007年秋季號，頁423-78。魏氏在他的三本日記中，詳細記述了他執行這項特殊任務的具體過程。魏氏賦予路易斯以「王平」的代號，並將此日記稱為「王平檔案」或「王平專輯」。
- ⑤ 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資料室編：《蘇聯大事記(1967-1970)》，未刊，1978年，頁174。
- ⑥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266；毛澤東：〈贊成越南又打又談的方針〉(1968年11月17日)，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頁583。